

文物鑒賞叢書

金文鑒賞

唐復年 著



秦朝銅詔版

Bronze Zhaoban (a plate inscribed with an edict by
Qin Shi Huang dated the 26th year of his reign, 221
B.C.), Qin Dynasty

北京燕山出版社

金文鑒賞

唐復年

北京燕山出版社

金文鉴赏

唐复年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5字数

1991年元月北京第一版1991年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0313—7/K·0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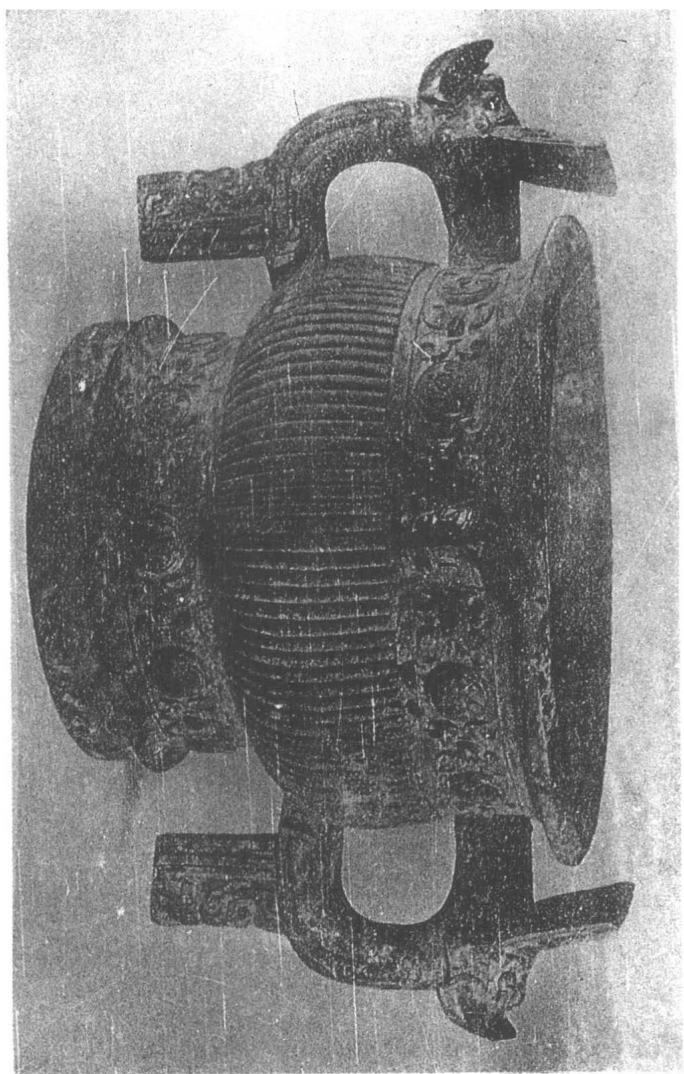
印数： 0 3000册 定价：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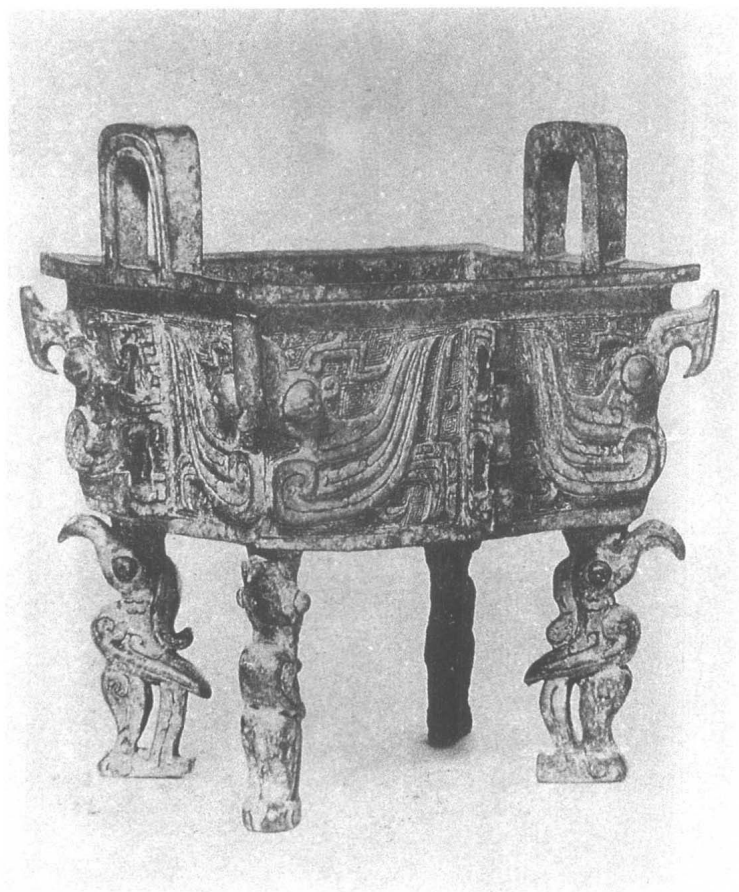
图版一 利簋 连座高28 口径2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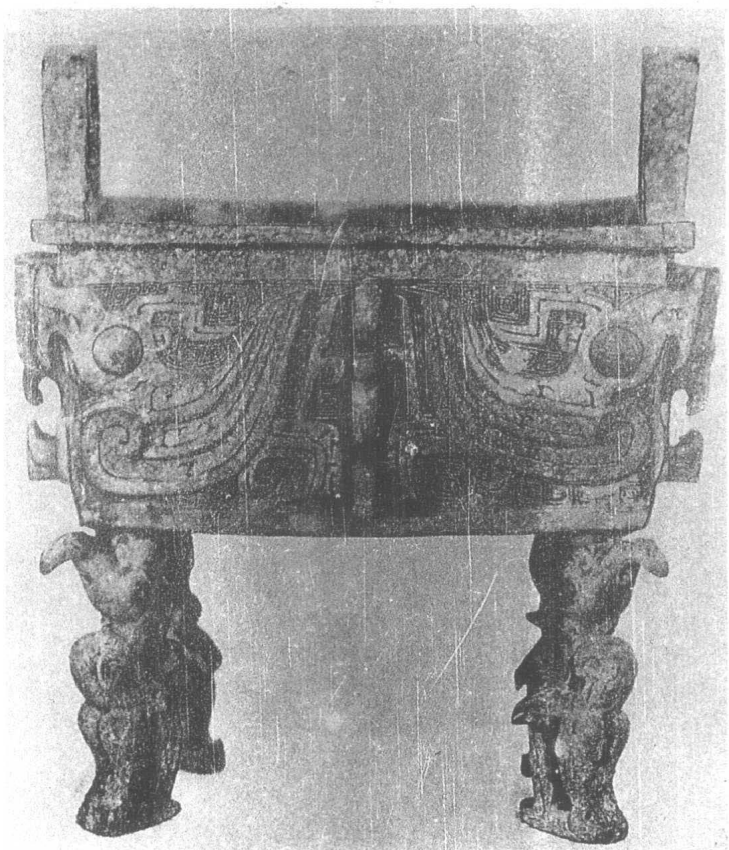
图版二 联鼎 连座高24 口径20.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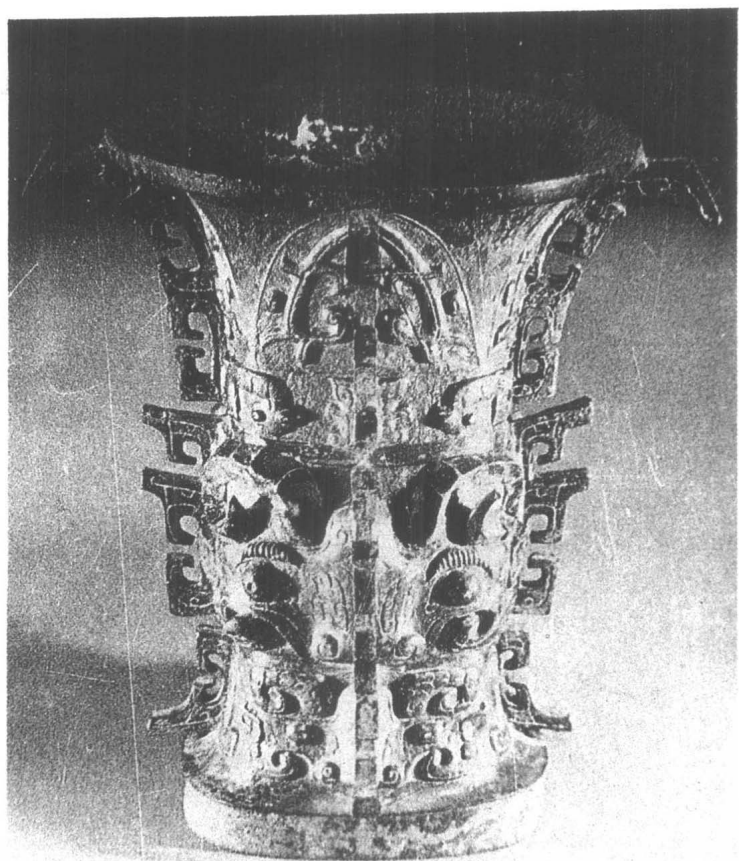
图版三 沫司徒送簋 通高23 腹径26.7 腹深14.7 圈足高6.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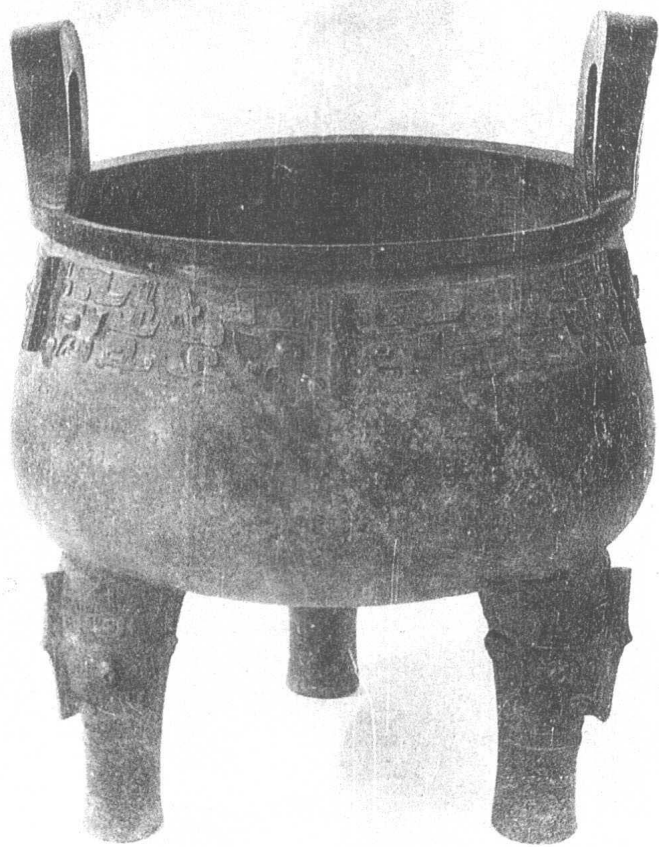
图版四 璽方鼎 通高25.4 宽22.9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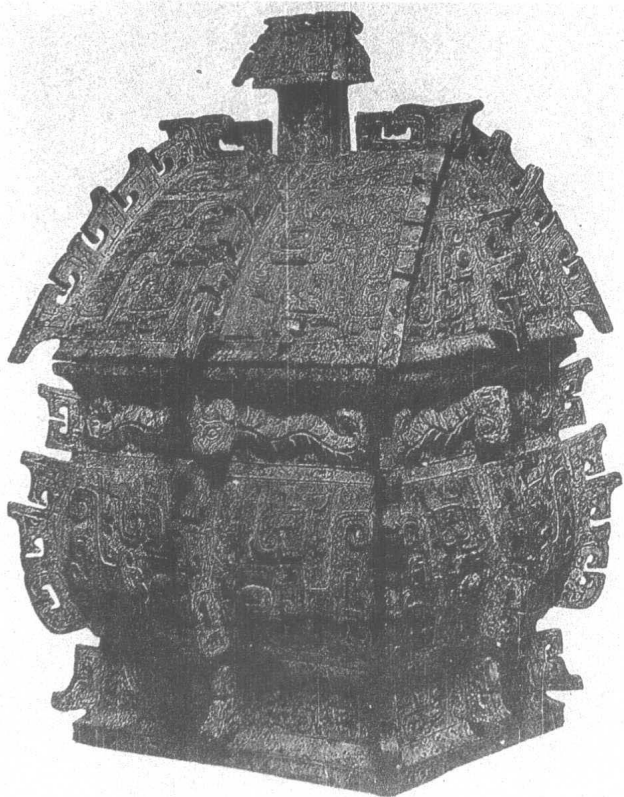
图版五 聖方鼎（前视）



图版六 柯尊 通高39 口径28.6 腹围61.6厘米 重14.6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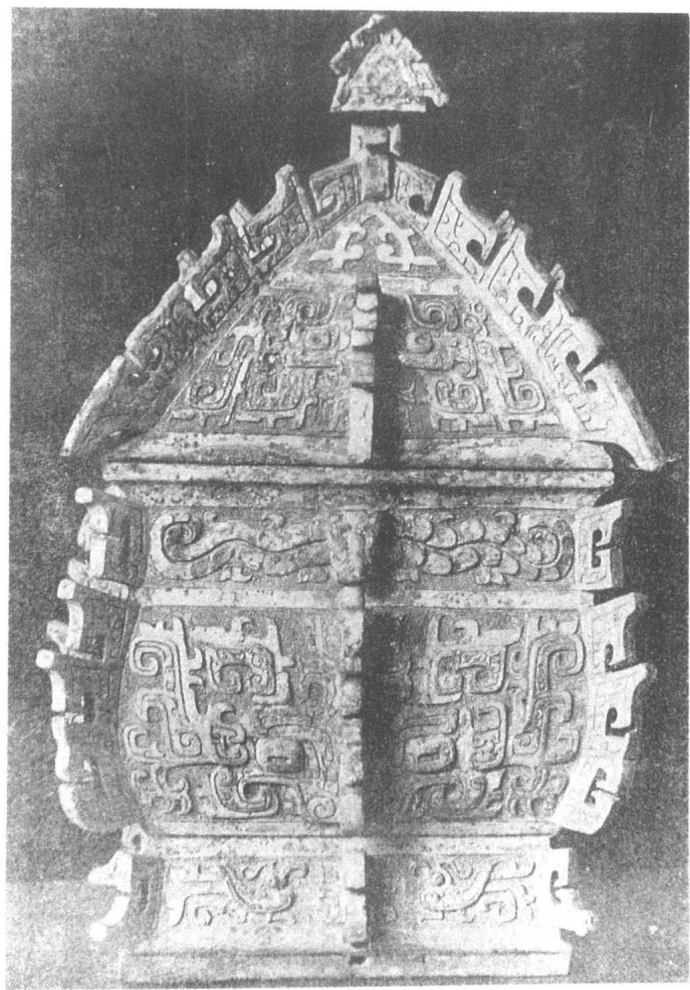
图版七 大孟鼎 通高102 口径78.⁴ 腹深49厘米 重153.⁵千克



图版八 作册矢令方彝 通高34.¹ 口径纵17.7横19.³
底径纵15.7横18.2厘米 重9.9千克



图版九 作册矢令方彝（前视）



图版十 作册矢令方彝（侧视）

目录

金文浅说

一、利簋

二三

二、朕簋

三五

三、沫司徒趯簋

四九

四、𨔵方鼎

五七

五、猗尊

六六

六、大孟鼎

八二

七、作册矢令方彝

一一六

八、班簋

一四一

九、五祀卫鼎

一六三

十、墙盘

一七八

十一、毛公鼎

二二五

十二、虢季子白盘

二七〇

金文浅说

一、金文的范围

商周时期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自宋代起称之为钟鼎文。古代的青铜器种类很多，一般分为乐器和礼器两大类，乐器中以钟最多，礼器中则以鼎最为常见，故古人以钟和鼎概括，作为一切铜器的泛称，而对其上的文字，自然就称为钟鼎文了。今天我们所称为金文的，当然不能只限于钟鼎和一般礼乐器上的文字，还应包括兵器、量器及其他青铜器上的文字，所以也就不宜再用钟鼎文这个旧称，而应正名为金文。

称青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主要是因为铜这个名称是近世才使用的，春秋以前铜就称为「金」，青铜器铭文中的「易（锡）金」，实际上就是赏赐铜，所以，大家就把青铜器上的文字统称为金文。

金文最早见于商中期（二里岗文化上层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早期的金文，较多的是图形的符号或为数不多的几个简单文字，它们所表示的仅仅是氏族

徽号或人名，还没有完整的文句。直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才出现了一些有内容的短文。至西周，铭文开始增长，记载的内容也比以前增多了，现已发现的百字以上的铭文就以百件计，其中最多的当推现藏台北市故宫的毛公鼎，铸有四百九十七字。这一时期的铭文格式多样，内容丰富，不仅有准确的干支月日及「月相」、地名及地理位置、当时的官职名称，而且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祭祀、征伐、册命、诉讼等各种活动的详细内容，反映出那时的政治、军事、礼制、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可用以补充和纠正很多古代文献资料的不足或失误，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极为珍贵的史料，所以很多人称誉青铜器铭文具有「书史」的性质。春秋战国时代，记录历史事实的铭文逐渐减少，至秦汉之交时，铭文的内容则只剩下「物勒工名」及记载尺寸和重量的作用了。

还需要说一下大篆、籀文、古文与金文的关系。

籀文一般指《史籀篇》中的文字，传统的说法是周宣王的史官名籀的人所编的字书，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称为大篆；「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是许慎才开始使用籀文这一名称，《艺文志》还说：「建武时亡六篇矣。」也就是说《汉书》成书时只能见到剩下的

九篇了。今日所见《淳化阁帖》中所录的《史籀书》之六个字，后世伪作之迹明显，只有《说文》中保存的二百余字才是可信的。经过认真的研究可以发现，籀文和西周的部分金文之间，有着密切的因袭关系，如：「子字籀文作，金文中利鼎铭作，小臣传卣铭作，作册旂斚铭作等。西周晚期虢王自作作的铜器——宗周钟铭作，孳乳为「孳」字，籀文的孳字作，与此形体极为相似。又籀文的则字作，与金文中柯尊、或方鼎、墙盘、猳匜、鬲攸从鼎等铭皆作同。可证籀文就是大篆，与汉代人的说法相同。另外，《汉书·古今人表》有史留，周寿昌以为就是史籀，王先谦赞同周说，以为「表次时代稍后」。可见史上确有其人，班固和许慎本不误。《艺文志》序录中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所以，史留就是史籀，大篆与籀文本为一体而二名。《说文》中所见到的形体，在西周至东汉的辗转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讹误，或受到春秋战国时期东方诸国文字的影响，以致与今日所见西周以前金文面目全然不同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似乎古文应早于「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汪国治《观堂集林·桐乡徐氏印谱